

论元朝的社会特征与文学格局

邱江宁

内容提要 立足于元王朝的社会特征，从其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文学格局自身独特性角度出发，观照文人群体流动的背景、流向区域以及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可以发现，元代文坛与元朝形势始终相副，总体上体现出崛起于西北、终迄于东南的特征。元中晚期之前的文人群体分布和文学格局体现出较明显的大一统、多民族、多文明碰撞交流的特征，末期则体现出裂变、东南地域性增强的倾向。元代文学的研究需要进行跨朝代的通观研究。

关键词 元朝社会特征；元代文人群体；地理分布；文学格局；创作特色

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2）^[1]，该著关于元朝杂剧作家的地域分布、南北流动以及对文学格局的影响，往往被学者引为不刊之论。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在资料丰富、考证精详的基础上，考察13世纪东迁西域人的华化情形，认为西域作家取得了不小的创作成绩，一定程度揭示出，西域作家群体对元代文学格局不同寻常的意义。王国维、陈垣二氏的研究可谓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及文献搜索等方面都给予后来者极大的启发。二氏之后，元代文学自身独特性的探究颇有加强，而就元朝社会特征与文学格局关系的探究而言，相关研究略有滞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情形颇有变化。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著都有相关章节注意到了元王朝社会特征对文学格局的影响，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杨镰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该著从西域作家用汉语写作的预备期、成熟期、丰收期、元明易代之际四个阶段来讨论西域作家群体对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深刻影响，不仅呼应了陈垣的研究，在理论认识上也颇有高度，诚如著作所指出的那样：“充分认识西域各族对中华民族文明所做出的共同贡献……是深刻理解历史发展过程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2]21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有关元代社会特征、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与文学创作格局研究逐步深入、细化^[3]。尽管相关探讨非常活跃，但也存在总体上重南轻北，重元末轻元中、前期，重诗文研究轻元曲研究等问题。而尤其突出且亟待加强的问题更在于：对朝代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在探讨文人群体的创作情形以及他们对于文学格局的影响过程中，对元代王朝的独特性之于元代文人群体流向和文学格局形成的深刻影响关注力度不够；整体性研究不足，较重视具体地域文人群体的文献爬梳与文学创作影响，对于文人群体的动态流动以及元代文学格局的整体观照颇为不足。

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构建，不能脱离元朝独特的社会背景而进行。《元史》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4]在这句话中，地理的、民族的、疆域的、道里驿站、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内容尽含其中，在这句话的背后，则是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和大一统元朝建构的进程。站在全局立场，从元朝社会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元代文学格局自身独特性角度出发，观照文人群体流动的背景、流向区域以及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不仅可以加强元代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而且可以在时空背景清晰的情况下，厘清元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将许多看似个别的文学现象进行较准确的逻

辑归位。元代崛起西北,疆域辽阔,最典型的特征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多民族、多文明并存。就其政治格局、行政区划以及用人态度而言,总体上表现为以北制南、重北轻南的特点^[5],元朝的最后崩溃与灭亡,也缘起东南地域的分裂。元代文坛与元朝形势始终相副,也体现出崛起于西北、终迄于东南的特征。元中晚期之前的文人群体分布和文坛格局体现出较明显的大一统、多民族、多文明碰撞交流的特征,末期则体现出裂变、东南地域性增强的倾向。

一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铁木真率领蒙古人以武功起家,试图将“有星的天空”“有草皮的大地”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蒙古人的赐予^[6]。这种“无阂域藩篱之间”^[7],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推动了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使得13至14世纪的世界此疆彼域的障碍被极大程度地打破。而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来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问题,则不能像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情形一样,由相对稳定的郡县划分、既定的地域环境、人群结构来探讨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情形以及他们在文坛格局中的影响。在蒙古人的影响下,元代文人群体的形成、地理分布以及文坛格局等,都与中原王朝的情形有诸多不同特点。

如果探查元代文学始终都不忽略蒙古人作为统治者这一背景的话,会发现全真教徒是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首先需要面对的群体。与其他时代的中原王朝统治者相比,蒙古人建立大蒙古国时既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8],“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9]。蒙古人对世界的体认和判断多来自于宗教的启悟,他们对于文字文明相当陌生,但对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统摄力量却非常重视。以此,对于他们征服或治下的多族群体,蒙古人往往先选择接近和信任宗教人士。全真教教主丘处机便是最早获得蒙古统治者信任的中原宗教领袖。全真教在蒙古治下时期,对北方社会的巨大影响,一直都是

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全真教作为最早得到蒙古统治者认可的汉地宗教,它自身的文人气质以及它对元代文学创作和格局的影响,很有讨论的意义。

公元1219年5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请丘处机。1220年末,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1221年2月,丘处机率弟子西行觐见远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驻营的成吉思汗,丘处机等人的西行改变了全真教的命运,“推动全真教走向全面兴盛,实现了教祖王重阳‘四海教风为一家’的遗愿”^[10]。就元代文学史而言,全真教对于蒙古治下时期的北方乃至元代文学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全真教徒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全真教所宣扬的思想也是元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更值得指出的是,全真教作为较早与蒙古统治者接触的宗教教派,少数全真教徒有机会前往蒙古人活动的中亚及岭北区域,并留下不少纪行作品,这是其时绝大多数作者无法实现的。在文学创作的时代独特性方面,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全真教徒的西游纪行创作与同时期的耶律楚材父子等人的相关纪行创作,已越出中原风土的范围,这种表现“非中原风土”的创作在蒙古人建立一统南北的元朝之后,更成为这个时代相当典型独特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真教的创作翻开了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这是他们创作中颇具时代意义的贡献所在。

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导致了13至14世纪各族人们的大范围流动。元代文人群体的形成、流向、分布,可能要追溯到蒙古南下攻金的时候。贞祐元年(1213)秋,蒙古人兵分三道南下攻金,攻破河北、山东、山西90余州,“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11]。尽管如此,对于主要精力尚用于征略天下的蒙古人来说,他们此时既无意也无力经营中原,以此,从贞祐之乱、金室南迁(1214),直至中统三年(1262)李璫叛乱之后汉人世侯制结束,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河北、河东(山西)、山东诸郡县,主要由汉人世侯掌控。汉人世侯的统辖区则成为金源文人群流动的主要地带,并因此形成一个个富有影响的文人群体。这些流动的文人群体不仅构建着蒙古治下时期的文学格局,而且还深刻地

影响到元初的文学创作局面。

以真定为例。“元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晋、豫四省，而燕人又占十之八九”^[12]，王国维所谓的燕人主要出自史天泽家族统辖的真定一带。真定成为元曲发展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蒙古灭金过程中，真定成为北方文人流动的重要区域。如史所载，在贞祐之乱中，由于史氏率众及早降附，于是“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3]，真定没有受到蒙古人的过分摧残。又据迺贤记载：“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14]也就是说，在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之后，原先金朝治下的经济、文化中心汴梁、郑州的民众都被迁居到真定，于是真定不仅保存了金朝故都的遗风，人口也大有增加。而且，真定作为南北襟喉之冲，交通便利，商贾四集，这也为真定戏剧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另外，史氏家族对真定一带的苦心经营，使真定在蒙古治下时期发展成为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根据钟嗣成《录鬼簿》所录前辈元曲作家，真定曲家有十家，约占五分之一，他们是史天泽、史樟、白朴、侯正卿、尚仲贤、戴善甫、汪泽民、李文蔚、侯正卿、王嘉甫和董君瑞等^[15]。尤其是白朴，他从1237年便随父亲白华寓居真定，大约中统三年（1262）离开真定南下，在真定生活的时间大约26年，他的杂剧也基本创作于真定^[16]。而从白朴在真定的交游圈来看，除史天泽、史樟父子外，他的总角之交、同学好友侯克中、李文蔚、戴善甫等都有杂剧作品存世。可以说，在真定统治者史天泽父子的支持与参与下，真定形成了以白朴等优秀作家为中心的真的杂剧创作圈。

不仅是真定，诸如东平、保定、卫辉、平阳、邢州等汉人世侯统辖区，由于汉人世侯的努力经营，都纷纷成为金亡后文人的重要流向区域。诚如其时文人魏初所指出的：“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竟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17]这些投奔各

世侯统辖区的文人进而在寓居地形成较有区域标识性的文人群，亦所谓真定文人群、东平文人群、保定文人群以及苏门山文人群、邢州文人群等。虽然在蒙金战争那样酷烈的时代里承受了过多磨难与困厄，但金源文人群体仍多恪守天职，不仅为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也对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的制度与文化建设贡献甚大。对于元代文学的创作面貌和发展格局而言，在南北一统之前，元代早期文坛格局基本为金源文人所把持。

二

南宋被一统之后，南北融合成为元朝包括文坛、政坛、思想等多个领域的较为核心的问题，它深刻地影响到朝廷的仕宦结构、社会资源分配、文人群体流动以及社会面貌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就元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南北融合情形而言，它实质上深刻地反映了元代中原与塞外的一统格局中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融进过程。而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也在元代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不能忽略的影响。

首先是南北融合对于元曲成就的影响。王国维认为元杂剧所以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在于它能摹写作者胸中之感想，而时代之情状、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常流露于其间^[18]。这所谓的“作者之感想”“时代之情状”，就包含着元代社会处处都体现着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生活的碰撞与融合情形。在元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辮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辮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19]。颇具“蒜酪味”^[20]的元曲，与其说是元杂剧独有豪泼诙谐的俚俗色彩和民间风味，还不如说是元杂剧对于其时人们“胡化”情形的真切描述，“蒜酪味”几乎成为元杂剧创作的基本底色。比如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其形象就反映了进入文明城市、无所作为的蒙古游牧民特征：

弹弓粘竿、馘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到有，我到

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21]

相对于定居民众而言，蒙古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形成的民族特性是“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22]。游牧民族缺乏物权观念，所谓“番家无产业，弓矢是生涯”^[23]，是他们生活理念的写照。所以，被定居民众视作抢掠的行为在类如鲁斋郎的蒙古人看来，不仅无伤大雅，甚至就是本分。这种物权理念的分歧，意味着定居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是元杂剧繁荣的中心，作为元朝的都城，大都正好位于农耕定居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交叉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几乎成为元杂剧展开剧情的重要基础。诸如《窦娥冤》《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汉宫秋》《西厢记》等名剧，都反映了这种社会情形。可以说，大都南北交汇的文化背景给予了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及其创作无限可能，而元杂剧的活力很大程度也来源于它。

饶有意味的是，元杂剧的繁荣离不开中原与塞外多元文明碰撞与冲突的背景，而元散曲在北人南下之后，在杭州形成了它的创作中心。曾经被苏轼喻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以它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南下的北人与本土的南人达成情感呼应的吟咏对象，从而推动了以“西湖书写”为中心的元散曲创作的繁荣。不仅有卢挚、刘时中、马致远等早期南下的北方文人，以西湖四时风景为对象进行同题集咏在前，还有白朴、奥敦周卿、贯云石、薛昂夫等曲家时时题咏其间，更推生了元散曲家的“南北双璧”张可久和乔吉的出现，他们大量创作以西湖为题咏对象的散曲。乔吉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而张可久更是“无日不西湖”^[24]，也就是说留下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散曲作家，他们的创作对象大多是西湖。以“西湖书写”为代表的元散曲，它所具有的重抒情、重意象、重锻炼的特征，既迥异于元杂剧重叙事、重主题、重情节的特征，又呈现出元代南北融合背景下，不同文化气质和土壤孕育出不同样貌形态作品的内在活力。

其次，南北融合对元诗创作风貌的影响。相比

于其他朝代的诗歌创作，元诗中题画诗的数量特别引人注目：“元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有诗文集存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题画、议画的诗文存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关系那样亲密”，“画上题诗、题文在元代空前高涨”^[25]。这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密切相关。在整个社会没有间断过的南北融合进程中，雅集活动推动了南北多族文人群体的大融合，而题画诗的直观性、聚合性、对话性，使它不仅有利于南北多族、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流和雅集，更推动了元人诗、书、画、印整合的趋势。“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的意境”^[26]，再加上富于个性色彩的印章、签名，诗、书、画、印四美合一，混融一体，这种同题创作、集咏行为不仅对元代题画诗创作的繁荣影响极大，而且还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定型。而南方的赵孟頫和北方的高克恭，他们的书画作品是元代人们雅集题咏的主要对象，现今留下来的作品中，人们直接为赵孟頫作品题咏的有146篇，为高克恭画作题跋的作品有125余篇^[27]。赵、高两人的作品本身已体现着浓郁的南北文化交融气息，那些以赏鉴、题咏他们的作品而进行的南北多族文人的雅集题咏活动，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形态，使得元代诗歌那种生动直观，富有对话感、画面感、场景感的创作气质有以形成。

在元诗中，还有一大典型主题——上京纪行诗，同样深深地浸淫着南北融合的影响。蒙古人崛起西北，最终一统南北，成为最高统治者，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得描述和表达他们活动轨迹的纪行创作，成为元代南北多族文人共同推动繁荣的创作典型。上京又称滦京、上都，元代自元世祖中统时期（1264）就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陷上都，“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28]，持续时间将近百年，几乎与元朝相始终。以此上京纪行诗不仅成为元朝南北多族文人相互融合的载体，更是元朝社会繁荣的象征和记忆^[29]。而综观上京纪行诗作者的身份，他们多为南方文人，如袁桷、周伯琦、虞集、杨允孚、迺贤^[30]、程文、郑泳等，颇能让人看到元代社会多民族融合的张力对于元代文学创作增长点的影响。

最后,南北融合对元代文章特征的形成同样深有影响。说到元代文章的特点,《元史·儒学传》中的这段话可引为典型:“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31]在元代文章风格成型的过程中,南北多族文人以程朱理学为探研核心,以通经为基础而进于作文,普遍追求“缜而不繁、工而不镂”、有“粹然粉米之章”而少“山林不则之态”的写作风格^[32]。宋濂在《元史》中认为,元代文章不仅上自馆阁下至山林,都能做到经艺、文章合而为一,而且以通经能文而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宋濂这个评价的得出,其实是他参与和见证元代文坛南北多族文人创作情形之后,较为中肯的看法。

程朱理学作为南方精英的思想精粹,却被凭借怒马强弓征服天下的元朝统治者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上升到官学的地位,这离不开南北多族精英的斡旋与推动^[33]。在元代文章风格形成过程中,科举考试发挥的导向作用固然重要,而南北多族馆阁文人与山林布衣之间迭相师友的影响作用更具有渗透性,尤其是西域文人对于元代以程朱理学为根,由通经而能文风格的形成意义显著。例如色目贵族赵世延“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34]。在延祐首科选拔进士时,他坚决要取录许有壬,而许氏文章以程朱理学为根本,“雄浑闳肆,饫切事理,不为空言”^[35],“涌如层澜,迫而求之,则渊靓深实”^[36],非常符合赵世延的文章审美追求。再如西域文章大家马祖常,曾两知贡举,并担任读卷官。马祖常不仅在担任主考官的泰定丁卯科(1327)中,选拔出萨都刺、杨维禎、黄清老、赵期颐、燮理普花、郭嘉、张以宁、李黼、观音奴、索元岱等一批元代中晚期文坛相当活跃的著名进士外,还推荐了诸如宋本、苏天爵、王守诚、陈旅等元代文坛风云人物。再如唐兀氏余阙,他留意经术,对五经皆有传注,对婺州文人的创作风格颇为认可,尤其对柳贯文章一根于理、崇本实而去浮华的风格大加推举,曾以浙东佾宪的身份命柳贯弟子宋濂、戴良等人汇次柳贯文集刊行,并亲

为序言。余阙之后,以宋濂为首的婺州文人群活跃于元末明初文坛。

总体而言,元代社会持续的南北融合过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原与塞外的二元一统格局,诚如清朝雍正皇帝云:“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37]。元代文坛也在社会的南北融合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大一统国家认同和维护的创作格局,而元代文学创作上的独特风貌以及它们的文学史贡献,也可以由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而获得它们自己的逻辑归位。

三

元朝社会突出的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内陆亚洲性特征,不仅使元代文学自身的丰富程度与研究的独特意味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而且藉由这些特征而产生了复杂文坛现象,如:元朝文坛的西域作家群体,由海、陆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带来的元代纪行创作的巨大繁荣以及中国形象的世界性传播与影响等,也使得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的讨论不能仅仅立足于中原王朝视角进行。

西域文人群体在元朝的出现,很大程度而言,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自1205年第一次侵入西夏开始,至1260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结束的成果。“西域”所涵盖的区域包括“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等区域,即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38]。这些地域族群构成复杂,有回回、哈刺鲁、阿儿浑、钦察、阿速、康里、斡罗思、术忽、也里可温等族类^[39]。在13至14世纪期间,伴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活动,西域人东迁情形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在西域人大量东迁至中原一二世后,他们逐渐“以中原为家”“不复回首故国”^[40],及其苗裔“乃能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41],且于“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42]。诚如陈垣指出的:“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

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43]

正是有了大量西域人读书的社会基础，元代西域作家群“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坛”，“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44]。清人王士禛也认为：“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马）祖常及赵世延、李术鲁翀、康里巎巎、贯云石、辛文房、萨都刺辈皆是也。”^[45]由于大量西域作者的群体基础，才有了王士禛所列举的那些闪耀于元代文坛、同时也不逊色其他时代的元代优秀西域作家。西域作家群出现在元代文学格局中，其重要意义在于，元代西域作家群体作为一个独特的创作群体，对元代文学乃至传统文学生态都深有意义。可以说，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的存在和影响，典型而鲜明地昭示，中华文明包括文学特征的形成，其实是多族文人藉由多元文明交流融汇形成的成果。

而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在推动 13 至 14 世纪西域人大举东迁的同时，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46]的大一统王朝。蒙古的扩张打破了东西方长期的政治壁垒，并在扩张过程中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通无阻。所谓“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47]，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性开放格局。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都与中国发生关联。“丝路纪行”缘此成为 13 至 14 世纪东西方世界相互观察、纪录和思考的最典型载体。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独立成卷的丝路纪行作品约计百余种，其中汉文文献 80 余种，外文文献近 30 种^[48]，这个数据意味着 13 至 14 世纪的丝路纪行创作在数量上，远超过自汉至宋 9 个多世纪的所有纪行创作数量的总和。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涌现了诸如《长春真人西游记》《真腊风土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岛夷志略》等一批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这些纪行作品不仅是

研究元朝社会的重要文献，对于元代文学格局而言，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创作内容。

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些能挺然秀出，在文学格局中具有不凡影响的文人群体或个体，他们的思想意识或者作品表达，要么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要么能恰切地反映出时代的独特情绪。

比如江西文人。历数有元一代江西著名作家，“元诗四大家”有虞集、揭傒斯、范梈等三位江西人占去三席；元代文坛的盟主，虞集之后有揭傒斯，揭傒斯之后有危素、周伯琦等，承接有序，代为领袖。江西文人的影响力不仅体现于元代文坛，在政治领域有程钜夫，哲学领域有吴澄，宗教领域有张留孙、吴全节等，地理领域有朱思本及其《舆地图》、汪大渊的地理纪行著作《岛夷志略》，语言领域有周德清及其《中原音韵》等，这些人及其作品在当时甚至今天，依然不失其划时代的意义。在江西文人驰骋文坛之际，其他地域，北方如金源文人以及西域文人等，南方如浙江文人、姑苏文人同样成绩斐然，但与江西文人的影响力相比，则稍逊一筹。为何大一统后，多元格局的元代文坛是江西力量占得头筹？尽管，江西作为南宋治下区域学术、文化的中心，诗文创作一直繁盛，但南宋治下时期，文化的中心更在浙江，为何不是浙江？若论政治优势，为何起初占有绝对优势的金源文人群没有保持优势？又或者更有政治优势的西域文人，以及其他地域的文人群不能成为强势力量？这非常耐人寻味。而细论这些江西地域出来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之所以影响不同于寻常，会发现他们几乎非常一致地表现出对元朝多族群共处的开放文化精神的理解。有一则耐人寻味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吴澄针对蒙古朝廷发布八思巴文字的态度与评价。至元二年（1265），在即将一统南北的前夕，有感于“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49]的世界性交流背景，忽必烈期望能创造一种蒙古新字，它可以“译写一切文字”^[50]。他把这一伟大设想交给年仅 31 岁的八思巴去完成。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经过几年

的探索和试验,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八思巴字。与汉字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汉字主形,八思巴字主声;汉字书写千变万化,但发声读音却不与之相应,而八思巴字则字形不繁、字数不多、发声完备。相比于汉字,八思巴字字不盈千,但“字甚简约,而唇、齿、舌、牙、喉之声一无所遗”^[51],“于是乎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52]。这深刻地契合了元朝多族群共处的一统王朝忽必烈“译写一切文字”^[53]的愿景,从而作为国家意志传达的工具,从中原中州一直到“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54]。在比较八思巴字与汉字的根本区别之后,吴澄深深感慨,八思巴字的创制诚可谓文字创造发展史的一大助推。吴澄的这层感慨不仅在于八思巴文字的伟大,更作为文明高度成熟的华夏子弟,承认异质文明的独特性和它们对华夏文明的补充与推助意义。吴澄的视野与胸襟以及哲学认知,引领着草庐学派成员诸如程钜夫、虞集、揭傒斯、范梈、危素、周伯琦等优秀作家,推动江西文人在元代一统文化语境中大领风骚。

元代文学中还有一种情绪特别值得探究,这种情绪几乎是元王朝从上至下,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便是跨文化、跨族群、跨地域交流碰撞中的乡愁情绪。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描述丘处机旅途中不食少语的情节,便极为动人地触及到这一情绪。作为宗教领袖,丘处机为了立教度人,不顾年逾七旬的高龄,历万水千山,进入蒙古人活动的区域,其意志力已然远超常人,但以血肉之躯,又长达三年颠沛转徙于迥异于自己平昔的生活环境,触目皆是不熟悉的风俗,入耳的都是自己不能理解的语言,触心的是自己无法进入的宗教信仰,这种杂糅着地理、民族、信仰、语言、饮食风俗等多重因素的乡愁,尽管不能让丘处机在意志上承认自己无力,但从肉体上把丘处机打倒了,他以不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乡愁,直至回到自己熟悉的母语生活环境中,才一切如常。李志常作为虔诚的弟子,用平实的语言叙录老师一言一行的同时,不经意中刻画出了那个时代很典型的跨地域空间、跨族群、跨文化碰触中的独特感受。虽然这种感受也可以命名为乡愁,但这种乡愁情绪在元代之前的

文学创作中没有元朝这么多元复杂,更不像在元朝那样,在自上而下、自中而外的人群中普遍存在。像耶律楚材在西域河中(中亚的撒马尔罕)那种无边无际的“寂寞”感,赵孟頫、虞集等为代表的北上南人那种听雨藏身、读书藏世,缠绵委曲的“江南归思”之念,还有伊本·白图泰、鄂多立克、孟特·戈维诺等身处中国的外邦人员,他们面对满城缺少宗教敬畏情绪的中国人的宗教不适感,甚至蒙古统治者们每年4至6月前往上都的清夏与祭祀活动,等等,都无不浸渍着这个时代富有趣味的特殊体验与情绪。诚如萨都刺所感叹:“月轮西转日生东,四海车书总会同。骑马出门天万里,山川长在别离中。”^[55]与之前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相比,元朝具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多个族群、多种文明形态共存,疆域辽阔、交通便利等典型特征。对于元朝的人们来说,广袤空间背景下,跨族群、跨文明形态共存和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不适、碰撞、冲突、融合可能是日常生活常态。这种生活常态可能会激发和表现出我族中心思想和交杂着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政治愿景等多元层面的乡愁表达。其曲折之情、婉委之态,站在以农耕文明为主、族群相对单一的社会视角,以古典、精致、温雅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的话,形式可能会显得有些粗糙,但却是元代文学奉献给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最具自己时代意味的独特内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客观而言,一方面,“蒙古人既没有打造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枢纽,也没有为世界经济提供独特的工业生产力,更没有发挥转运功能”^[56],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比较粗糙的管理经验使得元王朝对藉海陆丝路而形成的世界贸易以及东南地域的生产供给非常倚重,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57],即含蓄地指出了元朝经济的畸形发展格局。而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1348年开始,黑死病在欧洲泛滥,导致海、陆丝绸之路中断,元王朝与世界经济关联度大大降低,对东南经济的倚重更加强烈。这样,当地方豪强倚东南之地“聚糗粮,厚资储”^[58],由分裂南北,最终竟逼使强大的元王朝仓皇退出中原。另一方面,当大量财富滞留南方,东南生活富庶安逸,东南地域文坛地位因之加重,俨然与一直占据主导地

位的京师文坛分庭抗礼,形势甚至强于前者,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云:“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必集,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59]东南文坛的创作加重和强调了东南地域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与元朝疆域辽阔、多元文化共存的典型情形有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末的割据状态中,东南地域与外界的关联度也相对降低,这使得东南区域的作者对本域之外的文化更表现出或轻或重的忽略乃至漠视的态度。可以说,东南文坛力量愈强,愈加重了元代文坛的分裂,某种程度而言,以大一统、多元文化交融为特质的元代文坛可谓迥于东南文坛。

客观来看,在元朝即将灭亡、以及明朝已经更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内心对这个王朝的眷念和哀愍之情实际绵绵不止。无论是《青楼集》以记述“色艺表表”^[60]的歌舞之妓来展现元朝“混一文轨”“元元同乐”的“盛世芬华”^[61];还是顾瑛竭尽家财令“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62],并组织编撰玉山雅集系列,期望牢笼元季作家,以存一代之风骚,元朝的“文采风流”也曾“照映一世”,甚至让人“数百年后,犹想见之”^[63]。永乐中叶,李昌祺作《至正妓人行》,犹借妓女之口言“至正时繁华富贵事”,诗歌中“胡元运祚俄然歇,远遁龙荒弃城阙”^[64],对元朝亡灭的叹喟情绪依旧溢于言表。就这个视角而言,当元朝故老皆尽,明朝中期基于多种因素和背景而掀起的恢复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复古运动^[65],其中“胡运消沉汉道兴”^[66]的慨然情绪未尝不意味深长,值得人们进行跨越民族、跨越朝代的通观探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15BZW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2年完成,在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宋元戏曲史》。

[2] 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2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杜春雷:《元代地域文学研究综述与前瞻》,《社科纵横》2013年第1期。

[4][13][28][31][34][36][49][50][53] 宋濂等:

《元史》,第1345页,第17页,第949页,第4313页,第4163、4167页,第4203页,第1563页,第4518页,第451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5] 例如元朝对江浙行省的建置理念:江浙行省辖区基本是宋代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福建路等拼合汇聚,版图疆域南北较长,南端到北端直线距离约1500里;东西较窄,东端到西端距离约420至700里。省治杭州路地处北部,距本省北界300里左右,与南部边界直线距离在1000里以上。这颇能体现出蒙元统治者以北制南国策的深层次原因。参见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第211—2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无名氏:《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第432—4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 虞集:《可庭记》,《虞集全集》,王颀点校,第75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8]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许全胜校注,第6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22] 许全胜:《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第267页,第227页,中华书局2019年版。

[10] 钟海连:《金元之际全真道兴盛研究——以丘处机为中心》,第6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徐规点校,第850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 王国维:《录曲余论》,《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王国维论剧》,第17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

[14] 迺贤:《河朔访古记》,《迺贤集校注》,叶爱欣校注,第27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 门岢:《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

[16] 李修生:《元杂剧史》,第160—17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7] 魏初:《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全元文》第8册,李修生主编,第488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8]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9] 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钱茂伟点校,第13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0] 何良俊云:“高则成才藻富丽。如《琵琶记·长空万里》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然既谓之曲,须要有蒜酪,而此曲全无。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膂

盈前，而无蔬、笋、蚬、蛤，所欠者风味耳。”参见《四友斋丛说》，第342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21]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汇校详注关汉卿集》，蓝立葵校注，第155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3] 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元曲选》，臧懋循编，第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24] 高棅：《〔双调〕殿前欢·题小山苏隄渔唱》，《全元散曲》，隋树森编，第102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25]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235页，天津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6] 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宗白华全集》第2卷，林同华主编，第10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7] 数据由《元代画家史料汇编》统计而得。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第8—47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29] 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30] 葛逻禄人迺贤，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出生成长于浙江鄞州，是一个南方化了的色目诗人。参见邱江宁《浙东文化与元代西域人之华化——以迺贤的创作为讨论中心》，《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

[32] 余阙：《待制集序》，《全元文》第49册，李修生主编，第138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33] 邱江宁：《苏门山文人群与元代的“通经显文”创作取向》，《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35][63]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444页，第17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7] 《雍正上谕内阁》，永瑆、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15），第27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8] 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导言”第8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9]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引言”第2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40]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吴企明点校，第13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41] 吴澄：《玉元鼎字说》，《全元文》第15册，李修生主编，第23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42][43]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第4页，第

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4] 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45] 王士禛：《居易录》，《王士禛全集》，张鼎三点校，第3700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按：孛术鲁朮是女真人，不能算色目人。

[46]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全元文》第38册，李修生主编，第124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47] 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庠校释，第38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8] 邱江宁：《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与蒙古治下时期的异域书写》，《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

[51] 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全元文》第15册，李修生主编，第365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52][54] 吴澄：《送杜教授北归序》，《全元文》第14册，李修生主编，第100页，第100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55] 萨都刺：《将入闽赵郡崔好德求题輿地图》，《全元诗》第30册，杨镰主编，第15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56]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第151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57] 叶子奇：《草木子》，第5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58] 顾祖禹：《南直方輿纪要序》，《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第869—87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59] 赵翼：《元季风雅相尚》，《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第705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60][61]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第470页，第468页，黄山书社2009年版。

[62] 杨维禎：《雅集志》，《全元文》第42册，李修生主编，第500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64][66] 钱谦益：《列朝诗集》第5册，许逸民、林淑敏点校，第2406—2407页，第283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5] 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序言”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马勤勤